

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区乡村全域旅游扶贫效率的测算

刘祎¹ 王芳¹ 秦国伟² 田明华¹¹

(1. 北京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3;

2. 安徽省林业局, 安徽 合肥 230001)

【摘要】: 运用 SBM-DEA 模型与 ML 指数, 对全国 10 个集中连片特困区 189 个县(区)乡村全域旅游的扶贫效率进行测算。结果表明: 乡村旅游在集中连片特困区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扶贫成效, 但发展后劲不足, 乡村全域旅游为旅游扶贫注入了新的活力, 打破了效率持续下降的趋势; 整体上特困区乡村全域旅游经营体系较为完善, 乡村全域旅游要素投入量与发展规模较为契合, 但是乡村全域旅游的技术改进动力仍显疲乏, 产业基础不够强劲, 技术进步能力匮乏, 尤其是燕山—太行山区、大别山区等区域的纯技术效率较低; 各区域间的资源配置、管理能力、技术进步等方面很不均衡, 扶贫效率的高低差异显著。因此, 应大力推广乡村全域旅游, 通过创新要素配置方式、构建利益主体收益共享机制、发挥政府综合带动作用、发挥高扶贫效率区的示范引领作用等途径来提高乡村全域旅游的扶贫效率, 缩小各区域间扶贫效率的差距。

【关键词】: 乡村全域旅游 扶贫效率 SBM-DEA 模型 ML 指数

【中图分类号】: F59;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407(2021)08-206-07

0 引言

2020 年是实现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收官之年, 发展乡村全域旅游作为助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新兴力量与重要途径, 在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改善农村公共服务设施、挖掘区域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社会公平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具有发展乡村全域旅游扶贫的天然优势, 在全国 12.8 万贫困村中, 有 80% 的乡村具备旅游开发的基本条件。2017 年的数据显示: 2016 年, 500 家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18 亿人次, 同比增长 20%, 旅游总收入 1.76 万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28%, 旅游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均值为 21.5%, 旅游业发达的创建单位甚至高达 40% 以上; 2017 年, 中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共接待游客超过 28 亿人次, 收入超过 7400 亿元, 带动 700 万户农民受益。可见, 乡村全域旅游扶贫正以强大的市场优势与新兴的产业活力成为脱贫攻坚的新引擎。

现阶段, 国内学者关于乡村全域旅游扶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全域旅游扶贫发展的缘由研究^[2-3]、结构要素研究^[4-7]、效益研究^[8-12]、机理研究^[13-18]、开发策略研究^[19-21]、运行机制研究^[22]、资源优化研究^[23]等方面, 而关于乡村全域旅游扶贫效率测算的

作者简介: 刘祎,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农村发展。E-mail: 18279024@qq.com

田明华,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为农林经济管理。E-mail: tmhbjfu@163.com

基金项目: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发展中心业务委托项目“森林认证在天然林保护中作用机制研究”(KJZXZR202016); 北京林业大学热点追踪项目“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及林业产业发展的影响”(2019BLRD02)

研究较少，且现有的研究多使用传统 DEA 模型^[24-26]。该模型对于分析多投入多产出同类决策单元的效率分析具有优势，既可以避免传统线性回归方法只针对单一产出效率进行分析的缺陷，又不需进行量纲化处理，因此得到广泛应用。但该模型也存在两大缺陷：一是仅考虑投入过度或者仅考虑产出不足，无法从投入与产出两方面进行综合考虑；二是难以处理非期望产出^[27]。针对这两大缺陷，有学者对 DEA 模型进行了改进，构建了 SBM-DEA 模型，使得测算结果更加准确^[28]。鉴于此，运用 SBM-DEA 模型与 ML (malmquist-luenberger) 指数法综合测算乡村全域旅游的扶贫效率，从而为更好地发挥乡村全域旅游扶贫作用提供理论参考。

1 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

自全域旅游概念提出以来，文化和旅游部便开展了“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分 2 批公布了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名单，共计 500 个。其中有 280 个县(区)与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县(区)名单(680 个)重合。为测算乡村全域旅游扶贫的效率，我们选取集中连片特困区中实行全域旅游扶贫的 280 个县(区)作为研究区域，由于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甘肃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与滇西边境山区数据缺失，所以最终纳入模型测算的是除以上 4 个片区之外的 10 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的 189 个县(区)(受篇幅所限，具体名称省略)。

1.2 指标构建

根据《关于开展“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的通知》(旅发〔2015〕182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5 号)以及《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导则》《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验收、认定和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验收标准(试行)》中的基本考核原则和六大考核指标，构建乡村全域旅游扶贫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乡村全域旅游扶贫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要素层	指标层
产出层面	乡村扶贫	全域旅游脱贫	旅游脱贫人口占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比重当地农民旅游收入占全年纯收入的比重
		基础设施建设	二级公路里程数年人均用电量自来水入户率
		公共服务提升	普通中学在校生数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数
		生态环境改善	森林覆盖率空气质量满足Ⅱ级的天数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生活垃圾清运率
		农业发展能力	农用机械总动力 GDP 密度
	全域旅游	旅游发展全域化	旅游业增加值占当地 GDP 比重旅游示范村数量星级农家乐及乡村民宿数量
		旅游供给品	标准化旅游厕所数量乡镇卫生院数量自驾车补给点数量

		质化	
		旅游参与全民化	全域旅游从业人数占本地就业总数的比重年游客接待人次占本地常住人口数量的比重
		旅游效应最大化	旅游税收占地方财政税收的比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投入层面	生产要素	土地资源	投入全域旅游开发的土地面积
		劳动人口	劳动人口数、旅游培训人数
		投资水平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政府支出水平	本级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额

从产出角度看，应包含两个基本层次：

(1) 乡村扶贫。

包括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生活环境等各方面的综合提升，主要体现在全域旅游脱贫、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升、生态环境改善和农业发展能力提高五个方面。在全域旅游脱贫维度，选取旅游脱贫人口占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比重、当地农民旅游收入占全年纯收入的比重两个指标，这既可以从覆盖面上判断全域旅游脱贫的影响广度，又可以从个体面上判断全域旅游脱贫的影响深度。在基础设施建设维度，选取二级公路里程数、年人均用电量、自来水入户率三个指标，这是实现“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标准的基础。其中，公路里程数表征了当地经济对外联通能力，人均用电量表征了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自来水入户率表征了居民基本生活质量。在公共服务提升维度，选取普通中学在校生数、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数三个指标，分别代表乡村全域旅游对当地教育、医疗和福利层面的产出影响，涵盖青少年、中年、老年特征群体的主要社会服务性需求。在生态环境改善维度，选取森林覆盖率、空气质量满足Ⅱ级的天数、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生活垃圾清运率四个指标，通过乡村全域旅游对当地生态资本的影响来衡量脱贫的可持续性，包括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两个层面。在乡村发展能力提升维度，选取农用机械总动力、GDP 密度两个指标，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和三产融合发展程度，表征乡村全域旅游脱贫的产业提升能力。

(2) 乡村全域旅游。

从旅游发展全域化、旅游供给品质化、旅游参与全民化、旅游效应最大化四个方面反映阶段扶贫能力的大小和可持续扶贫能力的强弱。在旅游发展全域化维度，选取旅游业增加值占当地 GDP 比重、旅游示范村数量、星级农家乐及乡村民宿数量三个指标，表征乡村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布局、服务的发育程度及对当地产值实际贡献的大小。在旅游供给品质化维度，选取乡村全域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方面的指标，具体包括标准化旅游厕所数量、乡镇卫生院数量和自驾车补给点数量。在旅游参与全民化维度，选取全域旅游从业人数占本地就业总数的比重、年游客接待人次占本地常住人口数量的比重两个指标，用于衡量乡村全域旅游产业发展的人群覆盖面和群众参与程度。在旅游效应最大化维度，选取旅游税收占地方财政税收的比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三个指标，表征乡村全域旅游对当地财政税收的贡献水平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状况。

从投入角度看，乡村全域旅游扶贫的投入主要是土地资源、劳动人口、投资水平和政府支出四个维度的要素投入。土地资

源维度，选取投入全域旅游开发的土地面积指标；劳动人口维度，选取劳动人口数与旅游培训人数两个指标，分别衡量劳动投入的数量和质量；投资水平维度，选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标，衡量乡村全域旅游发展的外部环境优劣及全域旅游的社会福利效应；政府支出水平维度，选取本级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额指标，该项指标与产出指标中的旅游税收占地方财政税收的比重形成呼应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财政支出的引致效应大小。

1.3 数据来源

表 1 中的数据均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EPS 数据平台、《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以及历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鉴于精准扶贫政策于 2013 年之后开始实施，因此所选数据的时间跨度均为 2014—2018 年。对于不同年份的价格型数据，已通过统计年鉴中的 CPI 进行不变价处理。

1.4 研究方法

1.4.1 SBM-DEA 模型

根据 DEA 分析原理进行集中连片特困区的乡村全域旅游扶贫效率评价，实质是将集中连片特困区所在县(区)作为实际决策单元，根据每个决策单元的投入产出数据构造生产前沿面，把所有县(区)乡村全域旅游扶贫的投入、产出可能性都以前沿效率面为参考进行比较，最终得到各自的效率值，并针对各县(区)的效率值进行投入与产出的调整分析。传统 DEA 模型包括固定规模报酬的 CCR 模型^[29]和变动规模报酬的 BBC 模型^[30]，但传统 DEA 模型仅考虑期望的投入与产出，而未考虑投入变量的松弛问题和非期望产出问题，导致结果与实际有所偏差^[31]，为克服这一局限，Tone^[32]提出将松弛变量考虑在内的 SBM-DEA 模型。因此，采用 SBM-DEA 模型测算乡村全域旅游的扶贫效率。扶贫效率(ρ)公式为：

$$\rho = \text{Min} \frac{1 - \frac{1}{m} \sum_{m=1}^M \frac{S_m}{x_{m0}}}{1 + \frac{1}{N+I} \left(\sum_{n=1}^N \frac{S_n^g}{y_{n0}^g} + \sum_{i=1}^I \frac{S_i^b}{y_{i0}^b} \right)} \quad (1)$$

s.t.

$$\begin{aligned} x_{m0} &= \sum_{k=1}^K \lambda_k x_{mk} + S_m^- \\ y_{n0}^g &= \sum_{k=1}^K \lambda_k y_{nk}^g - S_n^g \\ y_{i0}^b &= \sum_{k=1}^K \lambda_k y_{ik}^b + S_i^b \\ \sum_{k=1}^K \lambda_k &= 1 \\ S_m^- &\geq 0; S_n^g \geq 0; S_i^b \geq 0; \lambda_k \geq 0 \end{aligned} \quad (2)$$

式中： ρ 为乡村全域旅游扶贫效率，取值范围是 $[0, 1]$ ，当 $\rho=1$ 时，生产单元完全有效，当 $\rho<1$ 时，生产单元存在效率损失，可以通过优化投入量、期望产出量与非期望产出量来改善乡村全域旅游扶贫效应； x_{m0} 、 y_{n0}^g 和 y_{i0}^b 分别为投入值、期望产出值和非期望产出值； S_m^- 、 S_n^g 和 S_i^b 分别为 x_{m0} 、 y_{n0}^g 和 y_{i0}^b 的松弛值； λ_k 为权重^[33]。

1.4.2 ML 指数

ML (malmquist-luenberger) 指数是对 M (malmquist) 指数的修正, 可将产出分为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34-35], 从 t 期到 t+1 期的 ML 指数可表示为:

$$ML_t^{t+1} = \left[\frac{1 + \overrightarrow{D}_0^t(x^t, y^t, b^t; g_y^t, g_b^t)}{1 + \overrightarrow{D}_0^{t+1}(x^{t+1}, y^{t+1}, b^{t+1}; g_y^{t+1}, g_b^{t+1})} \times \frac{1 + \overrightarrow{D}_0^{t+1}(x^t, y^t, b^t; g_y^t, g_b^t)}{1 + \overrightarrow{D}_0^{t+1}(x^{t+1}, y^{t+1}, b^{t+1}; g_y^{t+1}, g_b^{t+1})} \right]^{\frac{1}{2}} \quad (3)$$

式中: $\overrightarrow{D}_0^t(x^t, y^t, b^t; g_y^t, g_b^t)$ 为 t 期的方向性距离函数。若 $ML_t^{t+1} > 1$, 表示从 t 到 t+1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若 $ML_t^{t+1} < 1$, 表示从 t 到 t+1 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若 $ML_t^{t+1} = 1$, 表示从 t 到 t+1 全要素生产率固定。进一步可将其分解为技术效率 ($EECH_t^{t+1}$) 与技术进步 ($TECH_t^{t+1}$), 技术效率 ($EECH_t^{t+1}$) 又可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 ($PECH_t^{t+1}$) 与规模效率变化 ($SECH_t^{t+1}$), 公式为:

$$\begin{aligned} ML_t^{t+1} &= EECH_t^{t+1} \times TECH_t^{t+1} \\ ML_t^{t+1} &= (PECH_t^{t+1} \times SECH_t^{t+1}) \times TECH_t^{t+1} \end{aligned} \quad (4)$$

2 结果与分析

2.1 SBM-DEA 模型测算结果分析

2014—2018 年全国 10 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的乡村全域旅游扶贫效率测算结果如表 2 所示。可以看出, 在研究期间内, 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区乡村全域旅游扶贫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均存在效率损失, 以 2016 年为界, 整体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说明乡村旅游前期在集中连片特困区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扶贫成效, 但发展后劲不足, 而 2016 年国家推动乡村全域旅游为旅游扶贫注入了新的活力, 打破了效率持续下降的趋势。相比较而言, 规模效率值整体上高于纯技术效率值, 说明大部分区域扶贫效率的提升主要依赖于规模效应, 因此, 在未来发展阶段, 应注重规模集聚效应的发挥, 同时也应加快引进专业化、现代化、标准化的乡村全域旅游经营管理技术, 提升纯技术效率, 为乡村全域旅游扶贫提供持续发展动力。

综合效率方面, 2014—2018 年, 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区乡村全域旅游扶贫的综合效率均值分别为 0.85、0.81、0.78、0.79 与 0.85, 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除六盘山区外, 2014—2018 年, 大兴安岭南麓片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罗霄山区、吕梁山区、秦巴山区与乌蒙山区的综合效率值皆高于全国均值, 表明大部分区域在乡村全域旅游业的资源配置与管理方面具有较高水平, 资源投入也达到了较好规模, 少部分区域的综合效率较低主要是由于纯技术效率较低造成的。在研究区域中, 2018 年综合效率值最高的为大兴安岭南麓片区 (0.99), 最低的为燕山—太行山区 (0.65), 表明各区域间乡村全域旅游扶贫发展的资源配置、管理能力、技术进步等方面很不均衡, 扶贫效率的高低差异显著, 不过从标准差的变化来看, 各地区差距基本保持稳定, 并没有扩大趋势。

纯技术效率方面, 2014—2018 年纯技术效率的全国均值分别为 0.89、0.87、0.86、0.86 与 0.90, 整体保持在相对平稳的

良好水平上，略微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说明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区乡村全域旅游的资源配置和技术管理水平基本保持良好。2014—2015 年，纯技术效率值高于全国均值的区域有大兴安岭南麓片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六盘山区、罗霄山区、吕梁山区与乌蒙山区，占全部区域的 60%，低于全国均值的片区有大别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与燕山—太行山区，占全部区域的 40%，与综合效率高低水平基本保持一致，说明综合效率较低主要是由纯技术效率较低造成的；2016—2017 年，纯技术效率值高于全国均值的片区有大兴安岭南麓片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罗霄山区、吕梁山区、秦巴山区、乌蒙山区，占全部区域的 60%，低于全国均值的区域是大别山区、六盘山区、武陵山区与燕山—太行山区，占全部区域的 40%，占比变化主要是由于秦巴山区的纯技术效率提升所致；2018 年纯技术效率值高于全国均值的片区已经占到全部区域的 70%。在研究区域中，纯技术效率均值超过 0.90 的占半数，分别为：大兴安岭南麓片区 (0.99)、乌蒙山区 (0.96)、罗霄山区 (0.94)、滇桂黔石漠化片区 (0.94) 与吕梁山区 (0.93)，最低的为燕山—太行山区 (0.66)，说明整体上特困区乡村旅游经营体系较为完善，专业技术相对成熟，但仍需注重燕山—太行山区、大别山区等区域的纯技术效率提升。

表 2 全国 10 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乡村全域旅游扶贫效率测算结果

地区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TE	PTE	SE	TE	PTE	SE	TE	PTE	SE	TE	PTE	SE	TE	PTE	SE
大别山区	0.74	0.80	0.93	0.74	0.81	0.92	0.70	0.77	0.92	0.72	0.79	0.91	0.75	0.79	0.95
大兴安岭南麓片区	0.99	0.99	0.99	0.97	0.99	0.98	0.92	0.99	0.92	0.95	0.97	0.97	0.99	0.99	0.99
滇桂黔石漠化片区	0.91	0.94	0.97	0.87	0.91	0.95	0.84	0.96	0.87	0.86	0.94	0.92	0.92	0.95	0.97
六盘山区	0.84	0.90	0.94	0.82	0.87	0.95	0.75	0.80	0.95	0.75	0.80	0.95	0.85	0.91	0.93
罗霄山区	0.92	0.94	0.98	0.87	0.92	0.95	0.87	0.94	0.93	0.87	0.97	0.90	0.92	0.95	0.97
吕梁山区	0.91	0.95	0.95	0.89	0.94	0.94	0.83	0.89	0.93	0.85	0.91	0.93	0.91	0.96	0.95
秦巴山区	0.85	0.87	0.97	0.85	0.86	0.98	0.85	0.86	0.98	0.86	0.88	0.98	0.88	0.90	0.98
乌蒙山区	0.92	0.97	0.95	0.91	0.97	0.94	0.88	0.94	0.94	0.90	0.96	0.93	0.93	0.98	0.95
武陵山区	0.73	0.78	0.94	0.64	0.74	0.86	0.62	0.82	0.75	0.63	0.78	0.81	0.74	0.84	0.88
燕山—太行山区	0.65	0.72	0.91	0.58	0.67	0.87	0.51	0.60	0.86	0.54	0.61	0.89	0.65	0.68	0.96
均值	0.85	0.89	0.95	0.81	0.87	0.93	0.78	0.86	0.91	0.79	0.86	0.92	0.85	0.90	0.95
标准差	0.10	0.09	0.02	0.12	0.10	0.04	0.12	0.11	0.06	0.12	0.11	0.05	0.10	0.09	0.03

规模效率方面，2014—2018 年规模效率均值分别为 0.95、0.93、0.91、0.92 与 0.95，整体水平较高，略微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说明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区乡村全域旅游要素投入量与发展规模较为契合，但也应适当调整规模，使规模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得到更好发挥，增强市场竞争力。2014 年，规模效率值高于全国均值的区域有大兴安岭南麓片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罗霄山区、吕梁山区与秦巴山区，占全部区域的 50%，低于全国均值的区域有大别山区、六盘山区、乌蒙山区、武陵山区与燕山—太行山区，占全部区域的 50%。2015 年，规模效率值高于全国均值的区域有大兴安岭南麓片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六盘山区、罗霄山区、吕梁山区、秦巴山区与乌蒙山区，占全部区域的 70%，低于全国均值的区域有大别山区、武陵山区和燕山—太行山区，占全部区域的 30%，该变化主要是受六盘山区和乌蒙山区影响。值得注意的是，2016 年开展乡村全域旅游后，大

别山区与燕山—太行山区的规模效率值首次高于全国均值，说明在此期间，这两个区域的乡村全域旅游扶贫产业达到了较佳的规模，发挥了较好的规模效应。2014—2018 年旅游扶贫规模效率变化的标准差较小，同样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说明各片区规模效率初始差异很小，随着各自的发展，差距开始逐渐显现，而乡村全域旅游的推广，对缩小各地区扶贫的规模效率差距具有一定作用。

2. 2ML 指数计算结果分析

本文中， ML_t^{**} 指乡村全域旅游扶贫过程中要素投入转变为实际产出的效率，即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利用程度。 $EFFCH_t^{**}$ 用于反映全域旅游规划、管理规定、旅游扶贫政策体系、机制设计、利益联结、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社等制度层面设计是否健全，与当地生产力发展程度是否相适应。 $TECH_t^{**}$ 用于反映基础设施的通达、公共服务的改善、旅游品质的提升、产品质量的提高、现代化设备的引进、信息技术的革新等生产力因素带来的资源利用率的改变，而 $EFFCH_t^{**}$ 的改变又可以分为纯技术效率变化 ($PECH_t^{**}$) 与规模效率变化 ($SECH_t^{**}$)。具体结果如表 3 所示。

整体而言，2014—2018 年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均值分别为 0.96、0.93、0.97 与 0.98，均小于 1，说明旅游扶贫效率呈现降低的趋势，但降低的幅度在减小。六盘山区、罗霄山区、吕梁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大兴安岭南麓片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武陵山区全要素生产率基本处于下降状态，这主要是技术进步效率变化指数造成的。技术进步变化指数基本小于 1，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基本大于 1，说明在此期间，由于精准扶贫的制度化、体系化开展，乡村扶贫体系和扶贫机制基本完善，但是乡村全域旅游的技术改进动力仍显疲乏，产业基础还不够强劲。2014—2015 年乡村全域旅游扶贫效率取得进步的有大别山区 (1.01) 和秦巴山区 (1.03)，乌蒙山区维持不变 (1.00)，与综合效率变化相比，可以发现，虽然大别山区和秦巴山区有多项效率值位于全国均值之下，但发展潜力较大，尤其大别山区旅游资源丰富，潜山县、太湖县、岳西县、颍上县、金寨县等多个贫困县被列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加速了大别山区乡村全域旅游扶贫的发展。近年来，秦巴山区在乡村全域旅游脱贫方面组建了工作机制和工作体系，提升了技术进步效率指数，如四川省投促会在四川省文旅厅的支持下，组建了工作组赴秦巴山区贫困县开展旅游扶贫帮扶服务，建成了一批旅游扶贫示范区、示范村和乡村民宿达标户，带动贫困地区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得到改善，贫困群众通过发展旅游实现了就业增收，旅游扶贫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因此，2016—2018 年仅秦巴山区存在效率进步 (1.02)。燕山—太行山区效率最低，皆低于全国均值，表明该区乡村全域旅游扶贫效率欠佳，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虽然燕山—太行山区拥有丰富的自然、人文、历史旅游资源，但该区经济发展一直滞后，在充分利用区域旅游资源优势及国家政策支持，发展乡村全域旅游，带动片区农民脱贫致富方面仍显不足。

表 3 2014—2018 年集中连片特困区乡村全域旅游扶贫的 ML 指数变化

年份	2014—2015 年					2015—2016 年				
	EFFCH	TECH	PECH	SECH	TFP	EFFCH	TECH	PECH	SECH	TFP
六盘山区	1.01	0.97	1.00	1.02	0.98	0.95	0.94	0.99	0.96	0.89
罗霄山区	1.04	0.90	1.05	0.99	0.94	1.00	0.98	0.99	1.00	0.98
大别山区	1.02	0.99	1.01	1.01	1.01	1.07	0.85	1.02	1.04	0.91
吕梁山区	1.00	0.96	1.03	0.98	0.96	1.00	0.93	0.99	1.01	0.92
燕山—太行山区	0.97	0.89	0.92	1.05	0.86	1.02	0.84	1.12	0.92	0.86
大兴安岭南麓片区	1.01	0.95	1.00	1.01	0.96	0.98	0.85	0.98	1.00	0.84

滇桂黔石漠化片区	0.98	0.99	0.98	1.00	0.98	1.00	0.97	1.00	1.00	0.97
乌蒙山区	1.01	0.99	1.01	0.99	1.00	1.01	0.94	1.00	1.01	0.95
武陵山区	0.97	0.90	1.02	0.96	0.88	0.97	1.01	0.98	1.00	0.98
秦巴山区	0.99	1.04	0.99	1.00	1.03	0.99	1.00	1.00	0.99	1.00
均值	1.00	0.96	1.00	1.00	0.96	1.00	0.93	1.01	0.99	0.93
标准差	0.02	0.05	0.03	0.02	0.05	0.03	0.06	0.04	0.03	0.05

年份	2016—2017 年					2017—2018 年				
	EFFCH	TECH	PECH	SECH	TFP	EFFCH	TECH	PECH	SECH	TFP
六盘山区	1.06	0.93	1.01	1.05	0.98	1.06	0.93	1.01	1.05	0.98
罗霄山区	0.99	0.99	0.98	1.01	0.98	0.99	0.99	0.98	1.01	0.98
大别山区	1.01	0.99	0.99	1.02	1.00	1.01	0.99	0.99	1.02	1.00
吕梁山区	0.99	0.93	0.98	1.01	0.92	0.99	0.93	0.98	1.01	0.92
燕山—太行山区	0.89	0.99	1.00	0.90	0.88	0.89	0.99	1.00	0.89	0.88
大兴安岭南麓片区	1.01	0.97	1.02	0.99	0.97	1.01	0.97	1.02	0.99	0.97
滇桂黔石漠化片区	0.96	1.00	0.97	0.99	0.97	0.96	1.00	0.97	0.99	0.97
乌蒙山区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武陵山区	1.02	0.95	0.98	1.05	0.97	1.02	0.95	0.98	1.04	0.97
秦巴山区	0.99	1.04	0.99	0.99	1.02	0.99	1.04	0.99	1.00	1.02
均值	0.99	0.98	0.99	1.00	0.97	0.99	0.98	0.99	1.00	0.97
标准差	0.04	0.03	0.02	0.04	0.04	0.04	0.03	0.01	0.04	0.04

技术效率变化层面，2014—2018 年，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区乡村全域旅游扶贫的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均值基本等于 1，说明扶贫技术效率基本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这与 2013 年来，我国基本建成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全国性自上而下的帮扶机制和帮扶体系有关，且这套稳定的帮扶体系经实践证明是科学有效的。在大部分集中连片特困区，技术效率变化指数都在 1 左右，各年度技术效率变化指数标准差分别为 0.02、0.03、0.04 与 0.02，变化幅度不大。技术进步变化层面，2014—2018 年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均值分别为 0.96、0.93、0.98 与 0.96，说明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区乡村全域旅游扶贫技术进步效率不高，乡村全域旅游扶贫技术进步能力匮乏，因此在进一步的乡村振兴战略中，需要调整优化要素投入结构，需要引进科学先进旅游经营技术，提升旅游从业人员专业技能，推进发展模式创新，提高旅游资源利用率。进一步比较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技术进步变化指数，可以发现，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均值始终大于技术进步变化指数，说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更多的是依靠技术效率的提升，即制度管理体系的改善和进步，而技术进步动力不足，产业发展缺乏内生动力，因此现阶段需要强化乡村全域旅游技术层面的改进创

新。区域之间全要素生产率标准差相对较大，说明各片区乡村全域旅游扶贫效率存在一定差距，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的区域应当借鉴其他地区优秀的旅游扶贫经验。

3. 结论与政策启示

3.1 结论

基于 2014—2018 年全国 10 个集中连片特困区 189 个县(区)的面板数据，运用 SBM-DEA 模型与 ML 指数综合测算乡村全域旅游的扶贫效率，结果表明：乡村旅游在集中连片特困区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扶贫成效，但发展后劲不足，乡村全域旅游为旅游扶贫注入了新的活力，打破了效率持续下降的趋势；整体上特困区乡村全域旅游经营体系较为完善，乡村全域旅游要素投入量与发展规模较为契合，但是乡村全域旅游的技术改进动力仍显疲乏，产业基础不够强劲，技术进步能力匮乏，尤其是燕山—太行山区、大别山区等区域的纯技术效率较低；各区域间的资源配置、管理能力、技术进步等方面很不均衡，扶贫效率的高低差异显著。

3.2 政策启示

就发展动力后劲不足问题，一方面，需要创新要素配置方式，配齐要素形成合力，以整体效益为目的、打好“组合拳”，通过多渠道筹资、引进社会资本，实现项目资金整体效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应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大力推广乡村全域旅游，因地制宜采用恰当的发展模式，将整体规划与扶贫相结合，把好“方向盘”，围绕乡村全域旅游有序推进具备乡村特色的生态停车场、游客接待中心、农耕博物馆、民俗小吃城等乡村全域旅游项目。以乡村全域旅游为先导，激活“产业链”，通过开展乡村全域旅游基地的建设，点线面结合、形成全域旅游的基础设施和产业支撑体系。加快推进农村道路、安全饮水、电网改造、网络信息、广播电视、综合服务平台、电子商务服务站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乡村全域旅游的便利性与舒适性。加强传统村落民居和历史文化名村名镇的保护力度，突出地域特色，同时加大宣传营销力度吸引游客。

就技术进步能力匮乏问题，一方面，需通过整合财政资金、创新农村金融、吸引工商资本下乡、壮大集体经济来整合资金配置。通过“多元融资”撬动资金入股，把乡村全域旅游与田园综合体建设、“三变”改革、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结合起来，盘活农村集体资产和农民资产，整合耕地资源，实施棚户区改造，整合集体建设用地，推动资源变资产，整合财政资金折股量化到发展乡村全域旅游的主体上，提升农户尤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占股比例，实现家家是股东、户户可分红。另一方面，需从吸引城市人才进乡下村、培育开发乡村人才、激励乡村人才创业就业、完善乡村人才服务保障 4 个方面入手整合人才配置。提高乡村全域旅游发展带头人、经营户和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不断提升乡村全域旅游的服务质量和品质。建立人才引进机制，设立人才基金，畅通人才政策咨询、手续办理通道，开创人才社保转移、社保覆盖、社保补贴等新政，保障“绿领兴乡、能人回乡、市民下乡”的人才振兴策略顺利实现，通过人才资源的优先配置，激发农村创新创业活力。

就区域差异显著问题，一方面，需构建利益主体收益共享机制，明确政府公共服务角色，发挥政府在规划制定、政策出台、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人员培训、运营管理等方面的综合带动作用，建立起帮扶工作目标责任制，将挂钩扶贫成效列入对单位的考评内容，形成部门互动的联动扶贫开发机制。并推行旅游标准化建设，以国家/行业标准提升管理水平，将事前审批管理与事后监督管理相结合，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推进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更好地发挥旅游经济的溢出效应，使贫困人口共享发展红利。另一方面，效率高的区域需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效率低的区域应积极学习，实现乡村全域旅游扶贫的协同共进。

参考文献：

[1]朱琳琳.珠江—西江经济带广西段县域旅游扶贫效率测度研究[J].统计与管理,2020(4):48-51.

-
- [2]孙洁. 乡村旅游搭起的脱贫之路·政策解读:《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方案》[J]. 中国农村科技, 2016(11): 24-27.
- [3]冯楠. 川东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研究[D].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 2017.
- [4]李加林, 童亿勤, 时媛媛, 等. 中国乡村旅游研究综述[J].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9(1): 91-95.
- [5]宋玲, 吴国清, 丁水英, 等. 上海城市居民乡村旅游市场需求实证研究[J]. 旅游研究, 2009(2): 65-69.
- [6]高欣娜, 李春兰, 陆贵巧, 等. 北京市乡村旅游市场潜在性需求研究[J]. 林业经济, 2009(5): 74-76.
- [7]刘楦子. 我国乡村旅游研究综述[J]. 现代经济信息, 2017(20): 301-302.
- [8]赵承华. 乡村旅游及其推动农村产业结构优化研究[D]. 武汉: 武汉理工大学, 2009.
- [9]陈艳颀. 乡村旅游与农村劳动力就业研究——以南京市高淳县为例[J]. 安徽农业科学, 2013(1): 179-180, 321.
- [10]袁智慧. 海南省旅游业发展与农民收入问题研究[D]. 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4.
- [11]姚海琴. 乡村旅游业发展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D]. 杭州: 浙江大学, 2014.
- [12]党红艳, 金媛媛. 旅游精准扶贫效应及其影响因素消解——基于山西省左权县的案例分析[J]. 经济问题, 2017(6): 108-113.
- [13]付云. 全域旅游视角下长沙沙坪小镇新型城镇化建设研究[D]. 长沙: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14.
- [14]尹罡, 张旻. 旅游产业转型背景下资源非优区旅游开发研究——基于湖南省益阳市的案例分析[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14(3): 52-57.
- [15]杨振之. 全域旅游的内涵及其发展阶段[J]. 旅游学刊, 2016(12): 1-3.
- [16]郭毓洁, 陈怡宁. 全域旅游的旅游空间经济视角[J]. 旅游学刊, 2016(9): 28-29.
- [17]厉新建, 马蕾, 陈丽嘉. 全域旅游发展: 逻辑与重点[J]. 旅游学刊, 2016(9): 22-24.
- [18]盛毅, 喇明英, 盛祖添. 民族地区全域旅游导向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 经济体制改革, 2017(5): 11-17.
- [19]陈秋华, 纪金雄.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实现路径研究[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5): 196-200.
- [20]王东琴, 李伟, 岳洁. 云南传统农耕文明区旅游扶贫模式研究——以大理州巍山县为例[J]. 世界地理研究, 2020(1): 214-222.
- [21]唐承财, 万紫薇, 孙孟瑶, 等. 深度贫困村旅游精准扶贫模式构建[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0(1): 202-208.

-
- [22]石媚山.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运行机制、困境和策略[J]. 农业经济, 2019(5): 59-60.
- [23]钟学思. 广西瑶族特色村寨旅游扶贫资源配置效率分析及优化[J]. 社会科学家, 2019(3): 91-96.
- [24]黄燕玲, 王春. 基于 DEA 的国家级贫困县旅游扶贫效率研究——以广西石漠化地区 22 个县为例[J].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4): 55-66.
- [25]冯斐, 唐睿, 冯学钢. 西部地区旅游扶贫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甘肃省平凉市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20(2): 105-110.
- [26]杨佳, 周丽君, 李秋雨. 吉林省乡村旅游扶贫效率测度及路径优化[J]. 江苏农业科学, 2020(1): 21-27.
- [27]吕洁华, 付思琦, 张滨. 黑龙江省国有重点林区林业经济投入产出效率研究[J]. 林业经济问题, 2019(3): 300-306.
- [28]Tone K. A slacks-based measure of efficiency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01, 130(3): 498-509.
- [29]Charnes A, Cooper W W, Rhodes E. Measuring the efficiency of decision making units[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1978, 2(6): 429-444.
- [30]Banker R D, Charnes A, Cooper W W. Some models for estimating technical and scale inefficiencies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J]. Management Science, 1984, 30(9): 1078-1092.
- [31]Zhu J. Further discussion on linear production functions and DEA[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00, 127(3): 611-618.
- [32]Tone K. A slacks-based measure of efficiency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01, 130(3): 498-509.
- [33]苏世伟, 王丹丹. 山东省与江苏省造纸行业的生态效率比较研究[J]. 林业经济问题, 2020(5): 518-526.
- [34]Ray S C, Desli E. Productivity growth, technical progress, and efficienc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Comme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7, 87(5): 1033-1039.
- [35]Chung Y H, Färe R, Grosskopf S. Productivity and undesirable outputs: A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approach [J]. Microeconomics, 1997, 51(3): 229-240.